

新聞寫作知識



廣州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

说 明

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解放思想，整顿文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我党我军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新闻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现将《解放军报》社的一些同志，在一九七八年报社新闻训练班的讲课记录稿，翻印发给新闻干部和业余报道骨干学习参考。

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进一步肃清“帮八股”流毒

恢复和发扬革命文风 吕 梁 (1)

文风和认识路线 邵华泽 (25)

要不要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

一些是非问题 宋 维 (50)

要不要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兼谈新闻干事的职责 陈 捷 (69)

新闻的种类和写作上的基本要求 陈 济 (86)

当前在新闻报道中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 林 剑 (114)

谈谈先进典型的宣传问题 宋 群 (141)

谈谈人物消息 刘书忱 (160)

谈谈人物通讯的写作 和谷岩 (184)

理论文章写作的几个问题 卢纯田 (205)

谈谈调查研究问题	宋 琼(221)
新闻采访的几点体会	王建国(232)
编辑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	章文龙(245)
关于军事工作的宣传	林兆义(259)
为部队攀登军事科学高峰贡献力量	郑励新(283)
《党的生活》专版介绍	王 澍(302)
《思想战线》专版介绍	钱永祚(314)
《全民皆兵》——解放军报民兵专刊介绍	郑 训(328)
共同努力，办好《长征》	刘绍荫(339)
认真办好《读者来信》专栏	房亚田(347)
夜班工作介绍	苏 群(368)
怎样写“内参”稿件	肖 池(379)
修辞常识简介	杨子才(393)

进一步肃清“帮八股”流毒

恢复和发扬革命文风

吕 梁

文风问题，在毛主席倡导下，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年整风之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事求是，形成了很好的传统。为什么现在对文风问题反映如此强烈，引起普遍的关心？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文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帮腔帮调泛滥，“帮八股”流毒全国，祸及全党，广大群众对这一套确实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报纸首当其冲，那时真是难办，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

例如：一九七四年四月一位民主人士逝世，军报在二版中部刊登了一幅遗像。过几天后“四人帮”突然下令追查。原来在阳光下看，背面黑框正好罩住一版上毛主席接见外宾坐在沙发上的像片的一部分。军报为此被迫反复作了检查，几乎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是“透明看报法”。

又如：一九七四年三月，新华社发了延安吴家枣园社员批孔和四川原刘文彩地主庄园贫下中农批克己复礼两篇报道，军报发表时排在同一个版上。对此“四人帮”也严令追查，罪名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要在军报追查反革命。

发表一点具体生动的东西就挨打，一九七五年十月纪念

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军报发表了一批回忆录，读者反映受到很大教育。有些人打小报告上去，张春桥就一棍子打下来，勒令检查，硬说是什么“回头看”，“给老家伙树碑立传”。

反映一点群众关心的事也要挨批。唐山地区遭受强烈地震，一百万人民、十几万解放军抗震救灾，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报纸作了报道，姚文元一顶大帽子扣下来，说抗震“冲淡了批△”。

总之，不许说一句真话，不准有一点创造性，甚至连报纸上作者的名字也犯罪。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四月下旬军报文艺版发表一篇文章，一幅插画。两个作者都姓邓，一个叫日照，一个叫晓保，都是真名。竟有人专程来报社抗议和追查，硬说是搞翻案。

报纸如此，其它方面，如开会，也是一样。“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讲话必写稿，写稿必抄报”，讲的听的心里都有数。所以人们不愿看报，不愿开会。办报的人不愿征求对报纸的意见，不愿说自己是办报的。人们恨在心头，嘴里不说，心里想：物极必反，总有一天要彻底改变。这一天果然来到了。

粉碎“四人帮”，报纸得解放。大家对“四人帮”憋着一肚子气，所以，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整顿文风，一提出讨伐“帮八股”，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第一个问题：“帮八股”的表现

人们给“帮八股”列了许多罪状。比如：造假、空喊、不讲理、绝对化、影射攻击、千篇一抄、强奸民意、谬种流传，等等，不一一列述。看来流毒最深，危害最大，人们最

恨的，是一假二空。

“帮八股”的最大危害首先是假

新闻报道，典型事迹，经验介绍，必须完全真实，这是我们新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的传统。战争年代，我们发的战报，缴获几条枪就说几条枪，俘虏多少就说多少，从不虚报。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玩弄阴谋，以说谎造假为能事。他们不知撒了多少谎，制造了无数假典型。张铁生，大学迷成了“白卷英雄”；小靳庄，给了许多东西，硬说是没给一个钱；上钢五厂，年年减产说成年年增产；朝农经验，许多都是捏造的……这些都已尽人皆知。

在“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报纸宣传中，造假使人感到头疼。以军报为例：一九七七年经读者揭发，报社核实查有实据的假报道就有四十多起。其中一至九月二十起，十月发表了《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后，一个月间读者揭发的达十五起，合两天一起。这也并不是这个月登的假报道特别多，而是引起了读者注意，奋起揭发。十一月起有好转，但到年底，还发生七八起。今年以来，这种假报道仍然不少。

举点例子。去年六月，军报刊登了一篇通讯《华主席关心连队体育活动》，说华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曾给一个连队送了羽毛球、乒乓球和球拍，实际并无此事。报道干事的原稿没有写这回事，报道组长定稿时，记得听说过华国锋同志曾和九连连长打过羽毛球，有人说可能还送了球和球拍。组长觉得这个情节很有意义，就和另一同志议论，那个同志说：华主席当时是湖南省革委负责同志，到连队来打球，肯定带来球和球拍，打完后还会拿走？肯定送给连队了。于是就修改上去。报社打电话请他们核对，他们明明感到不踏实，

但又不忍“割爱”，就表示确有其事。报社又要他们寄一张照片来，报道组长请示政治处领导，据说这位领导以为是实物不在了，说就复制一套给连队放到荣誉室吧。于是越编越错，什么党支部经常用这些珍贵的礼品教育大家啦，战士捧着礼物表决心啦，等等。造假造到这种程度，极不严肃，危害也极大。

还有一篇，去年十一月，军报发表通讯《平时想战时，一心为打仗》，报道一个连队帮助白洋淀民兵开展军事训练，什么“船如梭、舟如箭，有的民兵练水上射击，有的练水上设雷，好不热闹”等等，也都是并无其事。文中表扬民兵连长如何制定方案，带领练兵，不仅是假的，而且此人是“四人帮”挑动武斗时某县城的武斗机动连副连长，稿件发表时已停职审查。报道中还有什么“老雁翎队员张大伯讲述战斗故事”，村上只两户姓张，一户没有当过雁翎队，一户是恶霸，早已被我镇压。

据调查，这篇报道是新闻干事定了题目后布置下去采访的。报道员认为，新闻干事的意思是要自己“合理想象”着写，至于实际工作，以后可以逐步完善。这篇编造的东西，政治处审稿时，也竟无发现，发表后在群众和民兵中影响极坏。

军报还刊登过一张假照片，是作者于一九七六年按照“四人帮”的调子拼凑起来搞所谓批判“雷锋叔叔不在了”，到一九七七年作者又拿出来作为歌颂粉碎“四人帮”后的新风尚。照片中除车站名是真的以外，三个人物中，问路的老太太是一个干部的母亲，身边的“小孙女”是另一家的孩子，指路的“学雷锋”战士是团里的放映员，是作者专门派车把他们从营房拉到车站导演拍成照片的。

说句公平话，我们的报道骨干，多年来为报纸宣传做了

大量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象上述这样公然造假的只是极少数。他们是受了“四人帮”的毒害，思想上追求名利，作风上违背实事求是。对这些同志是个教育问题，要帮助他们肃清流毒，消除这种不良风气。

还有一种弄虚作假，问题主要在领导。例如，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歪曲事实，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把一个曾经表示拥护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邓副主席讲话的战士，强拉硬扯，变成和军委“对着干”的“反潮流”战士典型。有关领导机关当时曾开大会表扬。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某些同志，在给报纸写的文章中，又猛批这个战士，还把代他整理的大会讲话稿，都说成是战士本人蓄意“攻击诬陷，诡辩胡讲”。这样有意地隐瞒某些真相，就很成问题了。

我们还曾发现，一篇根据某部队向军委正式发的电报改编的报道，也被揭发出是假的。把明明有当兵走后门，说成杜绝了走后门。这就看出，有些假报道的出现，问题是在某些领导人员身上。

前面举的，属于通篇捏造。这些毕竟是少数。至于浮夸失实的，则更多得多。

有的是“扭角度”。为了“紧跟形势”，一例多用。如：报道一件很有价值的发明创造，一九七四年说是批林批孔的成果，七五年说是贯彻军委扩大会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成果，七六年说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洋奴哲学的成果。最后稿子搞出来，“四人帮”已经垮台了，又说是粉碎“四人帮”的成果。再如，有个战士长了疖子坚持工作，先后被用作典型事例，写了八份材料。战士们说他“长了一个万能的疖子，总结经验成了万能的例子”。这些写材料、写稿子的同志，不去研究事物内部实际的因果关系，一项任

务完成了，今天这样引用，明天又那样引用。今天总结抓纲的经验，可以把它说成是抓纲出的成果；明天写落实业务的材料，又可以把它说成由于抓了业务；后天写贯彻规章制度，又可以把它说成抓规章制度取得的成绩。

有的搞“合理想象”，导演摆布。有些单位，先写好稿子，再给党委打电话说表了哪些态，让党委开会照演一遍。他们不是去反映事实，而是先写好新闻，据此去发号施令，制造事实。“四人帮”手上无真理，只能靠假表态制造舆论，我们决不能搞这些。

还有的是渲染夸大，把部分说成全体，偶尔说成一贯，计划做的说成已在进行，进行中的说成已经完成，等等，这就不多说了。

这里要多讲几句典型宣传问题。

典型宣传有极大的作用，如大庆、大寨、雷锋、硬骨头六连、空军航空兵一师；如王铁人、焦裕禄等，这些典型已经扎根在人们心里。这些典型的写作是实事求是的，因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由于“四人帮”大搞假典型，并抛出所谓“三突出”，什么典型必须高大完美，“起点要高”，“不受真人真事局限”等等谬论，搞乱了一些同志的思想，对典型宣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通常的毛病如：

一、夸张求全，任意拔高。

写舍己救人的典型，牺牲前常是：“耳边响起伟大领袖的教导”，“眼前闪现出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形象”，好象作者跟在身旁一样。

一般还有：把集体的说成一个人的，别人的说成自己的，三分说成七分。为了抬高典型，用贬低别人来衬托。为了

突出当前，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特别是有这么一种现象，往往是第一篇报道比较符合实际，后来作为较大典型继续报道，有的就出问题，写这一方面好了还不过瘾，另一方面也要好，各个方面都要好。比如：报道一个单位完成任务好，得了第一；那么肯定政治挂帅不错吧，再写一篇政治挂帅、学毛著好；学习要强调领导干部带头，于是再去搞一篇干部怎样带头学；当前反走后门很重要，就再搞篇抵制不正之风。写先进人物，在部队好还不行，一定要一生下来就好，当红小兵就是英雄，简直成了先知先觉。拚拚凑凑、真真假假，越写越全，也就越来越玄。

二、一好百好，完美无缺。

宣传典型不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去看缺点，也不许说缺点，说了就是砍红旗，结果不是害了典型本身，就是搞出来的典型站不住。我们读徐迟同志写的《哥德巴赫猜想》那篇报告文学，最后讲到，过去没有花，现在到处都是鲜花，你怎么办？这样的结语警惕人们不要骄傲，使人感到很亲切，很受教育，这就很好。我们常常把一些典型写得完美无缺，没有一点缺点，结果被宣扬者慢慢地就飘飘然，骄傲起来了。善意的指出缺点有什么不好呢？战争时期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有这么一条经验，对英雄模范，每开过一次表彰先进的大会，就要找他个别谈谈，指出他的缺点，警惕他不要翘尾巴，这样抓紧教育培养，典型就能巩固。如果不许批评缺点，“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典型就会站不住脚。另外，采访典型时只听好的，不听缺点，也容易搞错。军报一九七二年宣传了一个学雷锋典型，后来让他退伍，这个同志不满意，就拿出他的小本子来说，我做了许多好事，花了很多钱，你看我给同志们理发买个推子，花了多少多少钱；助民劳

动买个铁锹，花了多少多少钱；哪个同志家里有困难，给寄去了多少多少钱……他都有帐，说现在我得把钱要回来，不能够白干。这样的学雷锋“典型”就很成问题。采写这个典型的同志回忆，当时曾听到不同的反映，说这个同志动机不大纯。可是由于脑子里有这么个想法：下去了，能挖个金娃娃回来才好。于是，先入为主，不愿听别人说他有缺点，结果就搞错了。

三、还有一个问题，不论什么事，都要老典型来表态。

流传有这么两句话，一句叫“水深火热”，就是典型雷同，老是救落水、救火、拦惊马、手榴弹爆炸时掩护同志。第二句叫“山穷水尽”，某部队有两个连队，一个是“狼牙山五壮士连”，一个是“大渡河英雄连”，在一段时间，凡是有什么大事情，总是让这两个连队表态，表来表去，“山穷水尽”，没有多少话好说。把老典型当成聚宝盆、摇钱树、掏不尽的金饭碗，有的年年要新经验，写材料的同志憋得没办法，说谁能帮他搞出新材料来，愿把一个月的薪金奉送。这样做，其实是帮倒忙。我们有的连队就吃了这个哑巴亏，一九七六年要一个连表态批“整顿”为纲，当时要讲什么“整顿就是复辟”，于是就报道他们，说他们搞的整顿和那个整顿不一样，他们搞的是毛主席的新式整军。粉碎“四人帮”后，宣传这个连坚持年年搞整顿，有的连队就搞不清楚了，说他们那时不是批了“整顿”吗？这样，老是搞表态，确实害了一些单位。

这些典型报道是违背辩证法、违背实事求是的。因为报道不真实，本单位和周围的同志就不相信，只好“墙里开花墙外红”，甚至影响到“先进不愿当典型，群众不想学典型，领导不敢抓典型”。

假字的最大危害，一是使人不信任报纸。我们的报纸是党报，不是某一个人的，报纸的威信联系着党。群众对我们报纸的某些宣传不大相信，就会逐渐对党的宣传工作、对党的信任也产生不好的影响；二是败坏风气。报纸作风是工作文风的反映，有的领导喜爱虚夸，假报道就不但得不到纠正，而且会不断蔓延滋长，从领导到群众，上行下效，就把上上下下的风气都搞坏了。

“帮八股”的又一大危害是空

前面说的假字，举的例子主要是新闻报道中的。下面讲“帮八股”的又一个最大危害——空和绝，侧重举理论宣传中的一些例子。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手上没有真理，在理论宣传上也大搞弄虚作假。他们篡改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甚至假造所谓“临终嘱咐”。至于他们对历史的篡改、伪造，则更是到了不顾普通常识的地步。

除开捏造、编假之外，文风上还有空和绝。

一、抄袭复述，空话连篇。

林彪、“四人帮”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曾公开规定：“写文章讲话要多引毛主席的话”，“引毛主席的话和我的话，要十比一”。

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影响下，写文章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去分析实际问题，研究当前现实斗争，而是大段大段引用语录。当然，不是说不引用语录。但有许多文章提出问题不是从实际中来，而是以导师教导我们来开头，中间论证仍旧用语录，最后结论还是语录。有时引得实在太多，一片黑体字不好看，就一部分不用黑体，照抄

原文。报头语录也成了形式。外宾来，兄弟国家的，无非是朋友遍天下、互相支持这两条；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孔夫子说过“述而不作”，我们某些理论文章的作者，简直成了“述而不作”的信徒。

林彪、“四人帮”还强调不走样，并用“修正主义”、“态度问题”等大帽子围剿文章作者。于是，一个时期抄袭成风，套话成风，老话成风。有位读者曾揭发某个作者的一篇文章是抄来的，这个作者反问说，你看整张报纸的文章哪一句不是抄来的？我不过是整篇抄，抄一篇，你们是分散抄，天天抄。这种说法有点强词夺理，但是说出了一点真实情况，那时就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两校”。

在这种流毒影响下，写文章根本不联系实际，不接触问题，仅仅背诵一般道理。比如我们军队讲加强战备的一些文章，不管国际形势怎样变化，总是：（1）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2）帝国主义总是用突袭的办法发动战争；（3）要随时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人们把战备教育宣传叫作道理讲完（反来复去就是那几点），方法用尽（常常是在万人坑前忆苦、通过演习加强战备观念那几条）。论艰苦奋斗的文章，就老是先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再讲不艰苦奋斗就出修正主义，道理是老的，材料语言也是老的。那时写文章还要求每个提法都要有出处，每句话都要有根据。所谓根据不是客观实际，而是看书上说过没有；书上有还不行（比如很长时间不许讲政策，不准讲“左”的危害），非要“四人帮”的报刊说过的才行。

军报还出过这么一件事，真是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那时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句话说“苏修的侵略阴谋必然破产”，有人煞有介事地批判说：《红旗》杂志上写的是

“破灭”，你们为什么写“破产”？“破产”了还可以再干，证明你们对苏修仇恨不深。有的文章写部队干部“一心扑在战备上”，也受到严厉指责，因为“四人帮”说过：如果军队只讲反侵略，那反复辟还要不要？！

二、主观武断，蛮不讲理。

理论文章主要靠逻辑性和说理性去说服读者。“四人帮”的文章则是打人的棍子，根本不讲理。

他们把持语录的发表权，也把持批判的靶子，随心所欲地运用和解释。有的一段语录分三次拿出来，有的语录孤零零的一句话，不说明何时何地针对什么情况讲的，使人无法理解，更不能完整准确地领会。

他们给人判罪，可以不要任何事实，不讲任何道理，任意强加罪名。比如：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篇文章，洋洋数千言，大叫大嚷“风源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四个现代化的后面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等等，反来复去说“分析了大量事实”，“事实告诉我们”，可讲不出任何具体材料。

你说“三项指示为纲不可分割，不能丢掉哪一条”，“四人帮”硬说这是包藏祸心。难道三项指示“必须分割”、“可以丢掉一条”才算正确？明明说的是“打仗就是要钢铁，就是要有色金属”，“四人帮”的亲信硬说这是鼓吹“打钢仗”、“钢铁决定胜负”。

还有，搞了训练是丢了政治，搞不好训练是没有突出政治；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不抓生产是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等等。

这种坏风气也很害人，一九七六年被迫搞所谓批判时，有的人也学着这么搞。邓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曾说，

现在战士行军背的东西太重，要减轻战士的负荷量。这个讲话受到广大战士的热烈欢迎。可是到所谓批判的时候，有的就说，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不怕重，泰山也能背得起。听了这种批判，气得不少战士在背后大骂。

三、文字游戏，哗众取宠。

林彪大搞形而上学，什么“顶峰”、“最高最活”、“绝对权威”，灵魂中的灵魂、重要因素中的重要因素、高举高举再高举、落实落实再落实。流毒所及，使人不从内容上下功夫，而是搞文字游戏：“狠抓一个敢字，突出一个斗字，落实一个干字”，“发现苗头及时斗，抓住要害狠狠斗，跟踪追击不断斗”。……

林彪贩卖闪光语言，曾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大搞数字串子，什么一点两面、三三制、选干三条标准、三八作风、四组一队、四快一慢、四个第一、四好为纲、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六个战术原则、领导作风七个结合，政治教育八个侧面、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等等。

林彪带头吹牛，胡说红脑袋可以碰碎铁坦克。有的人拉练表决心，就说“腿断了扛着走，腰断了爬着走，脑袋掉了提着走”，“赶不上××连，捧着骨灰上西天”。部队干部战士对这种坏风气非常反感，讽刺他们光会吹牛，“说假话是会办事，说空话是水平高，说大话是干劲足”。

空话绝话危害也非常大，使人们不去扎扎实实研究问题，做好工作，而是说空话，吹大牛，耍嘴皮。能说会道的走红运，埋头苦干的吃不开。这样，国家怎么能建设，军队怎么能打仗？我们大家那时都看过自己孩子们写的作文和批判稿，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不是还严重地影响到后一代吗？！

“帮八股”的危害说不完，主要就讲这一些。

第二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文风的变化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党的作风、文风有了很大变化。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倡导革命文风。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就是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了宣传工作，夺回了宣传阵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主席讲话指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华主席特别号召：“要把被‘四人帮’践踏破坏的我们党的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回想起来当时听了这段话，觉得非常亲切，真是说到了人们特别是我们做文字工作者的心里。华主席、党中央，当时的中宣口和后来的中宣部，不断指示我们要肃清“帮八股”的流毒，指示我们怎样把文章写好，并对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及时给予了表扬鼓励。

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文章、讲话，以及中央的一些会议，给我们在改进文风上作出了范例。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大路线等，都是从实际出发，运用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文章和讲话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有分析，讲辩证法，以理服人，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